

□梁茂春采访/撰文

LIANG Maochun

曹安和采访录

An Interview with Cao Anhe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42(2014)03-0012-07

采访时间:1980年2月16日、1980年4月17日、1981年1月26日、1981年9月27日、1989年12月28日

采访地点: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西二楼,一单元五号曹安和家中、一单元十三号梁茂春家中

一、我和杨先生是姨表亲

梁茂春(以下简称“梁”):曹老师您好!我有些问题要请教您。主要是想请您谈谈您和杨荫浏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经历。您和杨荫浏先生的关系这么亲近,这么多年来一起合作撰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和专著。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不了解您和杨先生的关系。您能够从这个问题的谈起吗?

曹安和(以下简称“曹”;正文括号中内容均为曹先生本人的说明):我母亲和杨先生的母亲是亲姐妹,一个是大姐,一个是小妹,都住在无锡城里。我和杨先生是姨表亲。杨先生的父亲(我的姨父)有病,无事就呆在家里,脾气不好,身体好的时候上茶馆喝喝茶。他的父亲会写文章,遇到有人作寿时,请他父亲写一篇文章,能得一二百块钱。杨荫浏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我生在无锡乡下的查家桥,小时在乡下读书。后来十来岁时随父母到黑龙江两年,又回到无锡,先上无锡县立女子师范,又上无锡竞志女中。这时,与杨荫浏比较接近。他和他妹妹有空就来我家玩,他的妹妹和我的妹妹是同学。

杨先生的家庭算是一个败落的书香之第,到他父亲时家境已不太好了。杨先生的父辈名字是“金”字旁,他父亲叫杨钟琳。杨先生这一辈是“水”字旁,杨荫浏、杨荫溥都是。下一代是“木”字旁。所以杨荫榆是他的下一代了,关系比较远了。他们的名字是根据五行相生的意思命名的。钱钟书的爸爸是杨荫浏的舅舅。

他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不许出去玩。杨先生十二岁之前,上的是“家学”,是在自己家里办的学,读“四书五经”,每天写几百个字的文章。所以他在古文方面底子很深。当时他们的家境还好。他哥也是这么学出来的。杨先生到十二岁上高小,后来上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也是因为家境不好了,上师范可以不交学费。杨荫浏出去上师范以后,家里经济上就没有再管过他。

采录者简介:梁茂春(1940~),男,中央音乐学院退休教授;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31)

阿炳教过他几个月民族乐器，他父亲看阿炳有点“流气”，不愿他来教儿子，又请了另一位老先生吴畹卿来教他，当时吴老先生已七十来岁了，是“天韵社”的社长。

杨荫浏每天放学以后去“天韵社”学昆曲和乐器，回来先上我们家，吃完晚饭再回家。这时我跟他学昆曲。

他练字，刻蜡板（给“天韵社”刻过谱），抄谱。他没有的谱子就自己动手抄，别人都不愿这样干的。

他中学跑步、打拳，跳高，体育方面很好，画画也好。

二、杨先生大学辍学情况

梁：您能谈谈杨先生上大学的具体情况吗？

曹：1923年杨先生到上海圣约翰大学。

上圣约翰大学是他堂表哥（姓周，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做过驻墨西哥领事馆的工作）和表嫂资助他，每年借给他钱，上了两年圣约翰大学。后来他就陆续还这个债，一直到解放前夕才还清。他表哥、表嫂对他很好。杨先生的表妹跟我很好。杨先生自己的哥哥杨荫溥^①对他却不太好。

圣约翰大学有国乐团，是杨荫浏组织的。

杨先生的父亲一辈子有好几房，因为前几房都没有生儿子。由于家境破落，所以哪一房也没什么钱。而本房的兄长又歧视杨先生，因为他喜欢音乐，认为他不务正业。他哥哥杨荫溥只比他大一、二岁。杨荫浏是过房出去的，所以兄弟二人的情况很不一样，相比之下，他要艰苦得多。他哥哥是清华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的，回国后做银行经理，兼上海法学院教授等。哥哥叫他别上大学了，让他到无锡在银行做事，并负责照顾父母亲。但是杨荫浏没有同意，回到无锡后就在学校教书。父母是由哥哥供养的。

哥哥让他帮助翻译、编写了《中国交易所》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署的是杨荫溥的名字。为此哥哥给了他一百元钱。杨荫浏是在家里翻译，他翻译得很快。杨荫溥在中国经济界是很有名的，当过“兴业银行”的区经理，管理过四个省的兴业银行。40年代在重庆时，杨荫溥担任过七八个重要职务。“文革”开始后，他开煤气自杀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们圣约翰大学校停办了，他们在同年秋天又组织起了光华大学。大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杨荫浏从光华大学辍学后回无锡教书，一共教了三个学校，每星期有36节课，他骑着自行车在三个学校之间来回跑。所以，他的学习条件是很差的。他年轻时就睡得很少。他爱踢足球，会打三十多套拳，身体、精力都很好。

他跟教会的一个美国女传教士郝路义（Miss Louise Strong Hammond）学乐理、作曲、和声。郝路义对他最好，她懂音乐，还喜欢中国音乐。杨荫浏也教她昆曲和中国音韵，她能够写中国古体诗。后来，郝路义把他弄到南京翻译赞美诗，编辑《普天颂赞》。稍后到杭州的教会翻译、编辑赞美诗时，杨荫浏又跟一个外国人费佩德（Robert F. Fitch，搞地理的）一起工作，这时跟他跑遍了浙江的山区，还跟他学照相。杨荫浏一生喜欢照相，是从这时开始的。

三、我上北京女师大音乐系

梁：请您谈谈自己上大学学习音乐的情况。

曹：我在1924年考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我考这个学校，是冲着刘天华先生而来的。在考学之前，我自学琵琶，弹的是杨荫浏编的《雅音集》上面的曲子。我到北京之后，刘天华先生知道我是无锡人，问我：“有个曹承章，你认识吧？”我回答：“曹承章是我叔叔。”我叔叔曹承章是无锡荡口学校的校长，刘天华曾经在荡口学校教过音乐。所以他认识我的叔叔。

我在北京学习五年，到1929年毕业。这五年间，学校改了五次名字，可见当时社会和教育有多么动荡！

我们“女师大”的校址就在石驸马街。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地方当时是民国大学。两校相距约有二里地。每学期我们都要上台演出。音乐系开始时有20个学生，“闹风潮”以后，剩下了12个。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北京学生也游行。萧友梅主任不让我们参加，他对我们说：“你们女生共有20人，已经分了专业。你们五年就要毕业，定了初、中、高三级不同的标准，就是连晚

^① 杨荫溥（1898—1966），字石湖，1920年清华大学毕业，公费选送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1931年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兼任中央大学法学院、上海交大管理学院教授。解放后，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9月逝世。

上都弹琴、学习,你们的时间也不够用,用功还来不及呢,哪还有时间管什么外面的事!”

“五卅运动”时,“女师大”的音乐系、体育系是登报退出学生会的,我们表示不参加社会运动。音乐系的学生都放假走了,我就回无锡了。当时杨仲子是我们的教授。

章士钊是当时的“教育总长”,鲁迅骂他是“老虎总长”。因为章士钊要借故停办我们“女师大”,而鲁迅也是我们“女师大”的教师,鲁迅反对停办,他们就打起了官司,所以鲁迅骂他。

1925年“女师大”关门了。直到10月还没开学。家长们、学生们吵得厉害,都要求开学。到再开学的时候,学校变成了“女子大学”了,校长也换了。我们经常去找教育部长、次长,要求给我们上课的房子。我们上课就在教育部上,就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上课,给他们增加点压力。后来教育部就让我们在“女师大”的原址上课。但是不久原“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她们)又打回来了。总之非常混乱。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闹更大的爱国学潮,段祺瑞政府开枪打死了很多游行的学生。我们“女师大”被打死了两人,就是刘和珍、杨德群。

到1926年的冬天,冯玉祥倒戈,将段祺瑞政府驱赶下了台。1927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又驻军北京,并派刘哲出任教育总长,刘哲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所有的音乐科系。这时,仅有我们女子大学音乐系没有停办。

到1927年北伐的时候,萧友梅扔下我们不管了。他到上海去办国立音乐院,是杨仲子接管我们“女师大”音乐系,他当系主任。我1929年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教琵琶、箫、笙、钢琴。笙是我原先跟杨荫浏先生学的。

我一共当了七年助教。这时杨仲子是系主任。杨仲子后来去了重庆,在法国驻华使馆做过事,因为他的法文很好。“音乐教育委员会”成立后,杨仲子到“音教会”工作。他不当国立音乐院院长后,到礼乐馆以刻图章消磨时间,他是金石家,图章刻得非常好。他不会处理人事关系,陈立夫就不让他当国立音乐院院长了。

四、关于“一天五大枚的生活”

梁:最近我读了张寒晖的一篇文章,他是1925年从定县农村到北京“艺专”来学习话剧的,他当

时的学习生活很苦,过的是“一天五大枚的生活”。我不清楚这是怎么样的生活,“五大枚”是什么概念?您能够给我说明一下吗?

曹:1924—1925年间北京的生活水平大致是这样的:

“女师大”学生每月是7元钱的饭费。当时5元钱可以买一担米。那时的铜板分大枚、小枚两种。一大枚相当于20文,一小枚相当于10文。一个大铜板在南方可以买两根油条。张寒晖说他1925年上北京“艺专”时过的是“一天五大枚的生活”,那就是说:他一天最多只能吃十根油条,别的就啥也没有了。

再说细一点:当时12大枚等于一角银洋,12小枚等于半角(五分)银洋。十个铜板算“一吊”,要二十多吊才算一块银洋。“五大枚”还不到半角银洋。

每天“五大枚”,一个月也就是150大枚,相当于1.25块银洋。如果我们女学生的伙食费每个月是7元,张寒晖每月的生活费就是我们女生的五分之一。一个男生,青年时期,这样的生活确实是太苦了。

五、杨荫浏到燕京大学

梁:30年代杨先生在燕京大学担任过教师?

曹:1936年,北京燕京大学因为杨先生参加编辑的《普天颂赞》之影响巨大,就把他弄到北京燕京大学任研究员。许勇三的毕业导师就是他。

杨荫浏到燕京大学是刘廷芳要他去的。刘廷芳欣赏杨荫浏翻译的东西,因为他翻得又快又好。他们一起编辑过《普天颂赞》,刘廷芳是编委会主席,杨荫浏是编委会总干事。他们在一起工作时老吵架,但是越吵越好。他们是吵架吵出来的好朋友。在译配赞美诗的时候,杨荫浏要求翻译的中文赞美歌要有韵,并适合中国古诗的平仄;而刘廷芳是新诗派,不讲究声韵和平仄。他们两人为了这个事情见面就吵,各不相让。后来杨荫浏说:“我们不要争了,你我都把各自译配好的圣歌谱子发下去,让教友们唱,让他们来评说好坏。”结果是:学生和教友们都不唱刘廷芳译配的,而喜欢杨荫浏译配的。刘廷芳和杨荫浏他们吵归吵,但是互相都很尊重。刘廷芳喜欢杨荫浏,在北京时,杨荫浏就住在刘廷芳的家中。他帮刘廷芳翻译过好多东西。

杨荫浏还帮刘廷芳编过宗教文艺刊物《紫晶》,

刘廷芳任主编，杨荫浏负责实际工作。他们还一起编过《圣歌与圣乐》，一起在上面发表了不少关于圣歌圣乐的文章。

这时杨荫浏给燕京大学学生讲中国音乐史，从此开始在中国音乐史方面下功夫，他读了很多古书，做了很多卡片。

为了搞清中国乐律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他还自学了算命，结果发现“五行说”没什么价值。为了搞音响学，他就自学物理学。为了学昆曲，他学了填词作诗。为了绘制乐器图，他学了画画，能在一毫米之内画十几条等分线。后来，音乐研究所的好些乐器图都是他画的。这个事情，别人都是不愿意干的。

反正他干什么学什么，一学就钻进去，深感兴趣。我始终不明白：他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

六、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梁：请谈谈您和杨先生在重庆国立音乐院的工作情况。

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杨先生在中央机器厂担任出纳，并随工厂迁到云南昆明，一直干了好几年，还把母亲和夫人都接到昆明去了。这时，郝路义又把他叫回到音乐上来。

可是陈立夫也想叫他到“音乐教育委员会”去工作。陈立夫给了他一张飞机票，叫他飞到重庆，要他接受“音乐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先不见杨荫浏。这时，杨荫浏就叫陈立夫与郝路义商量，商定的结果是：杨荫浏一半为教会工作，一半为“音乐教育委员会”工作。

1940年，杨荫浏把他母亲和夫人送到上海，又转送回无锡。因为他的妈妈在云南呆不惯，他的夫人也觉得不舒服，母亲和夫人就经上海回到无锡。从此杨荫浏夫人就一直在无锡。杨荫浏从重庆寄钱给她们，开始时是可以寄钱的，到日本快投降的时候不能通邮了，没法寄了。

1940年我随杨荫浏去了云南，又到重庆。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书。

郝路义住在重庆求精中学。我们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书时，杨荫浏每两个礼拜要进城去一次求精中学，给郝路义翻译赞美诗，与她商量音乐。郝路义每月给他200美金。他拿教育部200元国币。冯玉祥那个时候没事了，写了好多赞美诗。他们一起商量赞美诗的事情。

那时音乐院的学生每人要学一年国乐，是作为副科。我在国立音乐院教过昆曲、琵琶、笙、笛子。杨荫浏教三弦、笛子（那时没有古琴），他会弹琵琶，学校只有几把琵琶，师生们要换着时间轮流弹琴。

七、我们在“文革”期间

梁：解放之后你们的研究工作又有了很大进展，但是我们对你们在“文革”中遭遇却不是很清楚，想请您重点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曹：解放初期我们到了天津，又到北京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所收藏的丛书很丰富，他就利用这个条件，一本本地看过去。这主要是在“十间房”时期^②干的。他对每本书都认真读。凡书中有很多音乐资料的，他做粉红色卡片；书中有一点音乐资料的，他做绿色卡片；凡完全没有音乐资料的，他做白卡片——以后这本书就不必看了。在这样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他重新写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到了“文革”时期，杨荫浏就挨整了。原因是因为陈立夫要重用杨荫浏这个人，不让他从昆明回无锡，专门给他买了飞机票让他到重庆去。还有就是刘廷芳想叫他到美国去办中国音乐研究所，刘廷芳是前燕京大学神学院的院长，肯定是“坏人”。

后来又有人说他是国民党文化界“戡乱委员会”的主要人物。实际上他始终没进过国民党的这个组织。

1966年8月24日，我们被“造反派”揪出来了。25日，批斗进一步扩大了，范慧勤、张淑珍等人也都被揪出来了。听说研究所就有“造反派”打过人。

杨荫浏被隔离了，隔离在中国音乐学院宿舍，劳动时让他打煤干，大家烧的煤干，都是他打的。音乐研究所从“十间房”搬到定阜大街中国音乐学院，宿舍就搬到了东直门外新源里。我们住到新源里的时候，杨荫浏还没有资格住新源里的楼房，分给他的是白塔寺附近的小厢房。后来才让他搬到新源里西二楼一单元，他住在四层，李元

^② 1953年民族音乐研究所在北京航空学院附近的“十间房”开始筹备，到1954年正式成立，一直到1966年搬到定阜大街中国音乐学院为止，这一时期人们称之为音乐研究所的“十间房”时期。

庆住五层。

1969年是下放劳动,先到张家口附近的怀来县土木公社西辛堡大队,杨先生也要参加劳动,后来照顾他年纪太大了,让他管大家的报纸、信件,抄大字报等。土木公社的土地不好,生活很苦,我们在那里的时间不长。杨荫浏身体是好的,70岁了,还能够给大家做煤饼,做煤球。

1970年初又搬到保坻县高康马大队,我也去了。不久又要搬到静海团泊洼。这次我没有和大家一起去。因为我们住的都是七八个人一间的屋子,而我睡觉时要打呼噜,同屋的人就不要我。军宣队就劝我去“投亲靠友”,但是我不甘愿。那时文化部有一个“老弱病残”的干校在湖北丹江,就让我一个人去了丹江。我想去投靠第三个侄子。到了丹江,我也要种菜、喂猪。

我到了丹江不久,他们就搬静海团泊洼农场。杨荫浏那时还有“问题”没有调查清楚,政策还没有落实。他在那里还写了一本书《音韵学》,可惜手稿丢了。

丹江口干校有很多老弱病残,李可染、滑田友、袁牧之等都在那里,都是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的老人。我们要自己买煤,自己生火。好在那里住的房子很好,生个火,还算暖和。军宣队管着我们。我们小组的正组长很不好,副组长很好。

我在那里喂过猪,这个活很累,喂完猪我就累得躺下了。我专门买了两个小一点的水桶,一个桶装15斤猪食,一次挑30斤,我弄了一根扁担来挑。喂一顿猪食要挑六七次。我本来腰、腿就不好,但是身体没有什么大病。

军宣队看我吃得很少,就允许我买罐头来吃,这是对我的特殊照顾。

1972年4、5月间我从丹江回北京。这时杨荫浏还没有回来。他是1972年秋天国庆节之前回来的,说是要他去湖南马王堆鉴定新出土的乐器。

回北京之前,1972年的春天,军宣队对杨荫浏说:你好久没出去了,到天津去看看,叫吴钊陪你去,他的车钱由你来出。杨荫浏说:现在春耕正忙,我不去。

总的说来,我们在“文革”中受的罪,大概比别人要好一些,因为音乐研究所的人不那么厉害。

一直到周总理下了命令,由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金缕玉衣”的出土,还有一些重要乐器一起

出土,命令叫杨荫浏到北京鉴定这些乐器,当时能够做这项工作的人都已分散了。杨荫浏才短期回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

1972年秋,杨荫浏、李元庆、李纯一一起到马王堆去鉴定出土乐器。从此他就一直没再下去劳动。在去马王堆的前半年,他的政治结论也差不多下来了。

杨先生一个是效率高,一个是笔勤。他的身体一直很好。

到1973年春,于会泳准备要出国,他要杨荫浏帮他写有关中国音乐史的一条一条的材料,他出国时要用。杨荫浏按照要求写好了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介绍,刚刚写完,正准备要抄写清楚的时候,一天晚上,他点了卫生香,其实他点错了,点的是蚊香,熏了之后,那天晚上就发病了,感到不舒服。实际上是脑痉挛。他出来敲旁边郭乃安的门。老郭就叫医生来,当天晚上解放军医生来了,后来他一直住医院。身体从此大不如前了。

总之,我觉得杨荫浏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中国音乐史、律学、器乐、昆曲(音韵)研究。

乐律研究,是他的一绝,成就是空前的。他对宫调系统的研究,应该结一个帐,否则他死了之后,就难了。他自己有点不愿写了,说:“让后人去搞吧。”外国人写的,都囿于书本的死材料,他能结合音乐实际来研究,他和民间艺人一起印证过一些乐律理论。

他给《音乐研究》杂志写了《三律考》,结了这方面的帐。他与缪天瑞先生不一样,他认为三种律可以同时用,实际上也已经同时用了。

他不爱谈他自己。只有在和别人辩论时,才说“我是怎么怎么做的。”

他不是在一个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很多方面下功夫,基础很深。

梁:谢谢曹老师!您给我们谈了那么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以后有问题了,我还会麻烦您!

采访后记:

亦师亦友亦亲人

我们和曹安和先生的亲密关系,一如我在《杨

荫浏采访后记：亲炙教诲生之幸》中所写过的，是师生加邻居、朋友的关系。但是我和曹先生的关系较之更为密切，是因为我的岳母（蔡良玉的妈妈）黄秀英和曹先生后来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她们年龄相仿，都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因此在晚年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我岳母经常会去曹先生家里小坐、聊天，而曹先生则经常扶着楼梯的栏杆，慢慢登上五楼来“回访”我的岳母，在她们聊天的时候，我有时也插上去问一些问题。因此和曹老师的谈话就显得更加随意，次数也更多，真是亦师亦友亦亲人。

我留存下来的对曹先生的采访记录共有五次，分别是：1980年2月16日；1980年4月17日；1981年1月26日；1981年9月27日；1989年12月28日。其中1980年2月16日是农历庚申年的大年初一，那天上午我们按照每年的惯例先到曹先生家拜年，下午又去她那里拜访，就和她谈起了杨荫浏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她自己学习音乐的经过。这次整理的《曹安和采访录》中关于她自己的学习经历，主要来自那一次谈话。

1981年1月26日的采访，是曹安和老师到我们家来和我岳母聊天。那时我正在撰写《张寒晖传》一书，我看到一个资料中说：张寒晖20年代在北京上艺术专科学校时，生活非常贫困，“过的是一天五大枚的生活”。我完全不懂“一天五大枚”是什么概念。而曹安和先生当时就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读书。于是我就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即，她就给我详细解释了“五大枚”的概念。曹老师的解释使我豁然开朗。我根据这次谈话，整理了《曹安和采访录》中第四节“关于‘一天五大枚的生活’”，也使我对张寒晖这一段贫苦生活有了具体、深入、鲜活的把握。

1989年12月28日上午的采访，是我和美籍华人音乐学家韩国鎡先生一起去拜访曹先生的。那时韩国鎡教授正好在北京访问，而采访曹安和先生又是我们两人共同的兴趣和愿望。这一次我们两人集中向曹先生询问了她和杨荫浏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曹安和采访记录》中第七节“我们在‘文革’期间”，主要是根据我们的这次采访记录而整理的。

以上是我对采访曹安和先生总体情况的概要介绍。采访往往像唠家常一样亲切自然。虽然每次采

访都有每次的侧重点，但也都有重复和倒叙的地方。我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在删除重复和纠正颠倒这两方面。

下面我想谈谈对曹安和先生采访中几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问题：

首先是曹安和与杨荫浏的亲属关系。由于他们二位数十年来一直在一起工作、一起著述、一起出席音乐界的各种活动，所以很多音乐界的朋友，尤其是学生一辈的人，都会以为他们是一家人，甚至误认为他们是夫妻。我和他们二位同住一座楼相处了十几年，也说不清楚他们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我直接问了曹安和先生之后，才完全清楚了——他们是很亲近的姨表关系，双方的母亲是亲姐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学习音乐，后来就一直在一起从事音乐研究工作。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他们在音乐学术上的相互合作，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

其次是关于曹安和先生的音乐学习之路。曹先生的谈话将旧社会一位青年女子学习音乐的艰难和独特说得非常的形象。应该说，刘天华、杨荫浏是她最重要的两位老师。其中刘天华是她演奏方面的导师，而杨荫浏则是她在音乐研究方面的引路人和亲密合作者。她所谈到的在北京女师大音乐系学习的经历，使我们对“五四”之后刚刚兴起的女子音乐教育艰难处境有了形象的了解。

第三，曹安和先生在谈到杨荫浏先生的家庭时，说明杨先生是出于“偏房”，又是“过房出去的”（即过继给别人当儿子的）。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庶出”在家庭中往往被人瞧不起，而且本房的兄长又因为杨荫浏要学习音乐而歧视他。杨荫浏能够上大学，是由于堂表哥和堂表嫂的热情资助，借钱给他上的大学。学习期间所借的钱，后来还债一直还到解放前夕。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杨荫浏先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艰难曲折，有重要的帮助。

第四，曹安和先生所谈的杨荫浏与刘廷芳的关系，非常生动有趣。曹先生说：“他们是吵架吵出来的好朋友。”杨、刘二人的友谊，很有点中国传统文人的特点，在学术上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但是在事业上又互相尊重，引为知己。

第五，曹先生回忆她和杨荫浏先生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据她回忆，杨荫浏先生因为“历史问题”而受到隔离审查，后

来又去农村参加劳动。当时杨荫浏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还要给大家打煤饼，做煤球，还要给大家分送报纸、信件，帮助别人抄写大字报等。关于曹先生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她谈得最为具体、形象，特别是在 1970 年她很不情愿地一个人离开了杨荫浏和熟悉的同事、朋友们，远去

湖北丹江，非常孤独地在那里种菜、养猪。当时曹先生也已经是 65 岁的老人了，身体又有病，但是仍要每天为猪挑食，来回奔忙。其孤独、无助的心情，可想而知。

曹先生所谈的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对我们深入了解“文革”有重要史料价值。



为谈龙建讲解《弦索十三套》(1985)



参加“纪念杨荫浏诞辰 100 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

这里附上两张我为曹安和先生拍摄的照片：一张是 1985 年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谈龙建向曹安和先生请教《弦索十三套》演奏中的问题时，曹先生正在进行解答。另一张是曹安和先生于 1999 年 11 月 9 日到昌平九华山庄参加“纪念杨荫浏诞辰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照片，已经 94 岁高龄

的曹先生是坐着轮椅参加这次大型活动的。这是她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我为她拍摄的照片也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责任编辑：郭 威)